



厦门烈士纪念碑。 南海网记者 孙令正 摄

琼崖英烈辉映八闽大地

◀上接 B2 版

运筹帷幄的革命先驱

在革命低潮期，他乐观积极，常常临危受命，挽狂澜于既倒。

在革命高潮期，他善于借势，往往临机应变，加速胜利到来。

中国革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期间不断出现高潮期与低潮期的交替，在部分革命环境恶劣的地方低潮期的出现更加频繁和长久，厦门及其周边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在王海萍接任福建省委书记之前的 1927—1931 年，福建省委已连续换过 5 任省委书记，其中有牺牲和叛变的，导致一段时间福建省委被迫撤销，随后成立的以王海萍为首任书记的厦门中心市委，又在 5 年内连遭 3 次破坏，最终无形解体。

在这样极其险恶的环境下开展革命斗争，不仅要有坚贞的革命意志，还要有乐观积极的心态和灵活机智的工作方法。

王海萍正是这样一个合适人选。他曾多次临危受命，在地方党组织面临重大挫败乃至革命低潮期到来时，力挽狂澜。

1927 年秋，正是中国革命最低潮，24 岁的他遵从党中央安排来到闽南临时特委所在地漳州，活跃在敌人心脏里，参与整顿闽南党组织，恢复了遭打击沉重的厦门市委。

1928 年 6 月，代理省委书记陈祖康投敌叛变，福建党组织面临严峻考验。王海萍迅速从闽西赶回，与刘乾初等商定应付对策，隐蔽党的各级组织，确保了党组织的安全。

1930 年 3 月，厦门反帝大同盟举行纪念大会，当局逮捕近 20 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该市监狱内的“政治犯”达到 46 人，包括市委书记和团省



厦门中山公园，王海萍就义的地方。 南海网记者 孙令正 摄

委书记等。

福建省委为营救这些面临被杀害危险的同志，决定采取武装劫狱行动，成立以罗明、王海萍、陶铸等 5 人为核心的破狱特别委员会，并成立 11 人的武装队。

经过 1 个多月缜密侦察和周密准备，5 月 25 日上午 9 时，他们利用周日监狱防备松懈的机会，里应外合实施劫狱。武装队一部分人以探监为名骗开监狱铁门，打死看守人员，用大铁钳剪断铁锁，放出关押者，另一队则以火力压制 30 多名警备队员。破狱行动仅十几分钟就胜利完成预定计划。46 人全部安全转移，我方无一伤亡，震惊海内外，在党史上写下光辉一页。著名作家高云览以此为背景创作了著名小说《小城春秋》。

王海萍的临机应变能力，不仅体现在恢复党组织和营救狱友方面，他的能力还体现在如何为失败的部队恢复元气和让陷入革命低潮的地区重兴。

1930 年 7 月，莆田红军 207 团遭遇重大失败，两任团长先后牺牲。危难中王海萍被委派到莆田，连续召开莆田党和团中心县委扩大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将该团从莆田城郊转移到莆田与福清边界的山区活动，同时加紧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发动广大山区农民支持红军，使 207 团很快得以生根和发展。这一系列举措还加强了闽中党的领导力量，使闽中革命斗争恢复生机。

优秀的革命者不仅要善于应对革命的低潮期，更要善于抓住革命良机，推动革命大步向前迅速迈进。

1932 年 4 月，毛泽东率领红军攻打漳州。时任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的王海萍立即发动漳州地区的武装力量和地下党组织密切配合，协同作战，成为红军迅速攻克漳州的重要因素。

为了抓住红军主力到来，国民党地方武装主力被歼灭的大好形势，王海萍一方面专程到漳州迎接中央红军，领导地方党组织配合红军开展工作。另一方面他迅速筹建闽南革命委员会，成立中共漳州中心县委；还亲自深入漳浦等地，动员和组织农民参加红军，有力推动闽南游击战争的猛烈开展。

国务院原副总理邓子恢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王海萍和我一起在漳浦，一面扩大红军，一面发动群众烧田契借约，宣布废租废债，杀猪、分谷子，打土豪、分田地，扩军大约搞了半个多月，队伍由以前的百把人扩大到六七百人。”

在中央红军的指导和推动下，厦

门中心市委先后创建了三块“小苏区”，是闽南地区最早形成的一块工农武装割据区域。红军攻占漳州后，王海萍当即抓住时机扩大游击战争，经过 1 年多艰苦斗争，形成了闽南地区的大片红色根据地。

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

面对爱人牺牲，他化悲为力，长歌当哭，以顽强革命来报仇；

面对生命威胁，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置个人安危于度外。

1930 年 3 月 25 日，厦门鼓浪屿的省委机关遭破坏，王海萍的妻子、秘书处会计兼保管惠贞等同志被捕，不久遇害。

王海萍获悉后，万分悲痛，但他依然咬紧牙关继续工作，向党表示：“不因此悲痛消极，只有再接再厉的前进，为同伴们算总账！”

他立刻想到的是他人安危。他立即部署应急措施，一方面“由省互济会电告全国济难总会党团急转中共中央”，另一方面即刻“通知厦门本岛内各机关”紧急隐蔽和疏散，并由团省委代为通知岛外各地党团组织暂停与省委机关旧址联络。

这一次，王海萍继续出色地表现了自己对党的忠贞，而这已经远不是第一次，自打参加革命以来，他已经屡次经受住了严峻考验。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依然坚定革命信念，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遭遇失败后，他也没有灰心，而是继续到上海寻找党，随后被派往福建恢复党组织。

他对党的坚贞，更体现在视死如归的气概上。1931 年，他在漳州的公开



厦门破狱斗争旧址。 南海网记者 孙令正 摄

活动暴露了身份，但他还是秘密返回厦门继续领导厦门中心市委工作。

1931 年初秋，他抽调闽南各县团宣传部长开办训练班。黄一石记得，自己在训练结束前问他，为什么暴露后不要求到别的地方工作？

王海萍的回答让黄一石印象十分深刻：“工作任务第一，个人安危在其次，党中央没有命令调我离开，我怎么能开口请调呢？我们既然参加革命了，就要服从党的需要，不怕苦、不怕死，即使牺牲了，也算对祖国对人民对党尽了责任。”

1932 年 6 月初，由于叛徒的告密，当王海萍按约去秘密接头地点厦门中山公园时，埋伏在那里的特务扑向王海萍，王海萍即与敌特展开英勇搏斗，满头满脸鲜血直流，终因寡不敌众，不幸落入敌手。

敌人逮捕王海萍后，妄图从他口中获得党的机密，采取收买手段，但他不为所动；敌人又严刑拷打，妄图使他屈服，但他坚决保护党组织。最后，年仅 28 岁的他于厦门惨遭敌人杀害。

福建省委在悼词中予以高度评价：“他的牺牲是福建党的一个不可抚摸的巨创，我们行列中不可填补的空隙。”

厦门破狱的胜利

文\海南日报记者 单憬岗

1930 年 5 月 25 日，厦门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一举攻破厦门监狱，营救出 40 多位被捕战友，取得中外劫狱史上少有的大胜利，史称“厦门大破狱”。

当时，一批又一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和红军干部被捕后押送厦门，投进了思明县政府内的看守所。随后在中山公园举行的“三·一八”惨案纪念会上，国民党缇骑四出，一举逮捕近 20 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使得监狱内的“政治犯”达到 46 人，其中包括团省委书记陈柏生、厦门市委书记刘端生。

这些政治犯实际上被定为死刑或无期徒刑，他们随时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而此时福建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白区和红区都急需干部。福建省委经慎重研究后决定武装破狱，成立了破狱委员会，由省委书记罗明、军委书记王海萍、组织部长谢景德、共青团省委书记王德、军委秘书陶铸组成。

经过一系列缜密调查和精心筹备，破狱时间定在 5 月 25 日。

上午 8:30，监狱外来了一群特殊游客，指挥者是团省委书记王德，他们准备必要时制造交通事故妨碍敌人行动。

担任接应队队长的省委组织部长谢景德，指挥着 10 多个接应队员分散在从看守所到码头一带，随时准备接应从狱中冲出的难友，把他们带到码头上船。两艘载壳灰的木帆船，已于 24 日傍晚停泊在码头。

武装队分为内外两队，外队 5 人，内队 6 人。内队分 3 批进入，最先进入看守所的前二批已顺利通过 2 道门，来到了既定战斗位置。但此时看守所副所长对其中一个队员产生怀疑，要搜身检查。第二批一位队员迅速拔枪击毙了副所长和另一个企图抵抗的看守。

听到枪声，在县府门口卖杨梅的老谢立即掏出腰中手枪，用两颗子弹结果了执勤的门警，随后同陶铸等 5 位外队队员一起冲进大门，埋伏在上庭院右台阶北边，以台阶为屏障，严防正在吃饭的警备队出来。

正在吃早饭的警备队员听到枪声还不以为意，以为是外边放鞭炮，继续吃饭。警备队长还探出头来吆喝“干什么”，话声未落，陶铸眼明手快，立即打出一梭子弹，把两个警备队员打倒。正吃饭的其他警备队员吓得各自逃命。

与此同时，内队队员各负其责，争分夺秒，砸铁锁、开牢门；早有准备的狱中难友，在狱中党支部书记刘端生的指挥下，迅速冲出牢门。

从打响第一枪至难友们冲出牢门，前后仅仅 10 分钟时间，十几位破狱英雄就完成了营救 40 多位政治犯全部冲出牢房而我方无一损失的光荣任务。

按预定计划，狱中难友冲出县政府大门由接应队员接走后，武装队便迅速分散隐蔽起来。在监狱附近一间小楼上进行现场指挥的罗明和王海萍等也旋即离开了这里。

按原来的分工，散布在县府门口至碧山路的接应队同志，每人带着三五位出狱难友，顺着碧山路和太师坟后面的巷子直奔海边的打石字码头。10 分钟内 40 多位难友分别登船，迅速扬帆起航。为了掩人耳目，两艘船还故意在海上驶来驶去，假装在海上捕鱼。

破狱结束半小时之后，厦门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才得到共产党打破思明县政府看守所的消息，但不知道共产党有多少武装。

厦门大破狱的胜利，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和反动气焰，解救了大批共产党的骨干，鼓舞了革命者和革命群众的斗志。